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40771065）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 综合治理

王发曾 主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编委会

主编 王发曾

编委 王发曾 闫卫阳 刘静玉 王胜男 徐晓霞 赵 呐
马少春 赵 威 陈蜀园 李 猛 程金龙 郭志富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章 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犯罪问题	001
第一节 城镇化与我国的城镇化	002
第二节 快速城镇化的社会效应	014
第三节 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犯罪	034
第二章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法理基础	053
第一节 人类行为的形成机理	053
第二节 犯罪与犯罪学	064
第三节 国外犯罪理论研究	074
第四节 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	093
第三章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科学平台	115
第一节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基础理论	115
第二节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应用理论	138
第三节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实践途径	162
第四章 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关键技术	180
第一节 地理信息技术	180
第二节 空间句法技术	196
第三节 城市设计技术	212

第五章 城市犯罪的公共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 ·····	230
第一节 城市犯罪的公共空间盲区分析·····	230
第二节 城市犯罪的公共空间盲区综合治理·····	246
第三节 城市公共空间盲区的犯罪案例·····	261
第六章 城市犯罪的非公共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 ·····	277
第一节 城市犯罪的非公共空间盲区分析·····	277
第二节 城市犯罪的非公共空间盲区综合治理·····	296
第三节 城市非公共空间盲区的犯罪案例·····	314
第七章 城市犯罪的边际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 ·····	331
第一节 城市犯罪的边际空间盲区分析·····	331
第二节 城市犯罪的边际空间盲区综合治理·····	350
第三节 城市边际空间盲区的犯罪案例·····	365
第八章 城市犯罪的移动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 ·····	382
第一节 城市犯罪的移动空间盲区分析·····	382
第二节 城市犯罪的移动空间盲区综合治理·····	395
第三节 城市移动空间盲区的犯罪案例·····	410
第九章 城市犯罪的虚拟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 ·····	425
第一节 城市犯罪的虚拟空间盲区分析·····	425
第二节 城市犯罪的虚拟空间盲区综合治理·····	443
第三节 城市虚拟空间盲区的犯罪案例·····	456
后 记 ·····	470

前 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散地，城镇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与进步的主要潮流。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方面，城市以其强大的经济、社会实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机能以及优越的成长发育潜力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生长核；另一方面，城市又因其固有的缺陷、人为的破坏和演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带来许多社会问题。高度的繁荣伴随着一连串的“城市问题”，人口规模失控、经济结构失调、社会关系失衡、土地负担过重、资源供应紧张、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就业难、住房难、入学难、就医难、乘车难等，已成为现代城市虽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共同“病症”。犯罪就是植根于这样的社会“病灶”中的一颗“毒瘤”，在城镇化进程中，犯罪问题就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城市犯罪是深深植根于城市空间地域环境并与各种城市问题相伴而孳生的社会“毒瘤”，直接侵害的对象是当代人类社会的“心脏、大脑和神经中枢”。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社会进步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变化：在健康城镇化的进程中，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针。党的十六大把“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城镇化成为21世纪前半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纲领，2020年后我国将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在这个社会潮流中，与犯罪作斗争理应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核心课题。尤其是与城市犯罪作斗争，试想，如果危及一半国人安全的城市犯罪持续猖獗，城镇化肯定被侵蚀，我们的社会又何来小康与和谐？在城镇化进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必然要求城市为国民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居住和工作环境，国民“免受犯罪之侵害”应成为小康、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

犯罪行为有显著的空间动感色彩，而“空间”却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城市犯罪的本质禀赋。在我国传统犯罪研究中，城市犯罪的空间性往往被遗忘或淡化，对犯罪的

载体——犯罪场所的空间环境条件、犯罪行为的空间特征以及从空间角度防控犯罪等研究，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犯罪最直观的表象是犯罪人的主体行为与受害者的受体行为，行为本身往往伴有空间位移；而犯罪场所的载体“行为”，即场所的空间形态，往往是主体行为与受体行为相遇、相撞的必要条件。空间既是分析城市犯罪特征的一个视角、影响城市犯罪的一个因素，也是构成犯罪事件的一个要素、实施犯罪防控的一条途径。

由此，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命题——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即在城镇化进程中，正确处理显现的或潜存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打击犯罪个案与铲除犯罪土壤相结合，消除城市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中可能孳生或加剧犯罪问题的各种空间隐患，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的可防控空间”。

犯罪背后都隐含着可能直接或间接诱发犯罪，并不利于防控犯罪的各种盲区，如社会盲区、心理盲区、时间盲区和空间盲区。所谓“空间盲区”，是指那些不易被公共防控系统或个体防控行为所觉察的，“有利于”犯罪发生而可能成为犯罪场所的空间。在城市犯罪中，含有共同或相似区位因素的空间盲区，根据其性质可分为公共空间盲区、非公共空间盲区、边际空间盲区、移动空间盲区和虚拟空间盲区。受不良区位因素的影响，城市犯罪的空间盲区往往有着明显或潜在的防控缺陷，致使防控体系的各种力量难以发挥作用，从而给犯罪主体与受体的碰撞提供了空间载体。可以说，整个城市犯罪问题、局部的犯罪高发区（点）以及犯罪的个案等，都与各种类型的空间盲区有着十分深刻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因此，研究城市犯罪空间盲区与综合治理，对从根本上铲除犯罪发生的条件与基础，保障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我们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及其综合治理”（2008~2010年，编号：40771065），历时三年，已于2011年年初结项。本项目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文献述评、代表性城市调研和典型案例分析，重点研究了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形成原因、构成、表现形式、存在机理和作用机制，不同类型空间盲区与犯罪之间的内在联系、导致犯罪的行为模式和作用，以及综合治理的途径、实施方案和措施。本项目在设计之初预定的目标是：争取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建筑设计等工作开展犯罪的空间防控提供理论依据和工作方案，为清除各类城市区位点可能存在的犯罪空间盲区隐患提供途径、工作方案和办法，为城市“平安和谐社区”的建设、管理和优质发展提供依据和工作方案。

在项目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这部《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本书分九章。前四章为基础理论与方法论。第一章是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犯罪问题，从城镇化的概念、国际城镇化的趋势以及我国城镇化的状况入手，分析了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各种社会效应，论证了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犯罪的特点、形成土壤，导出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概念。第二章是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法理基

础，从分析人类的一般行为、法律行为和犯罪行为形成机理入手，对犯罪与犯罪学进行了辨析，对国外的犯罪理论进行了评述，在阐述犯罪防控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城市空间防控的大环境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研究框架，力图为本研究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法理基础。第三章是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科学平台，阐述了空间防控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理清了空间盲区的分析思路，开辟了空间盲区综合治理的主要途径，既构成了本研究的科学平台，也为以下各类空间盲区的分析与综合治理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四章是城市犯罪空间盲区分析与综合治理的关键技术，阐述了地理信息技术、空间句法技术与城市设计技术的科学原理、实现路线以及在空间盲区研究中的应用，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持。后五章为公共、非公共、边际、移动、虚拟五种空间盲区的分析与综合治理，从分析各类空间盲区的概念、特征和类型出发，探讨了形成盲区的原因，进而分别提出了各类空间盲区综合治理的理念、重点、基本途径和实施措施。

总之，希望本书为完善和丰富犯罪学、犯罪地理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为创建城市的可防控空间，为我国城市法治社会建设并推动健康城镇化进程，作出微薄贡献。

王发曾
2011年10月

第一章 我国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犯罪问题

城市是以人为主体的一定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心，是国家与地方行政管理的“总部”，是调节国民经济活动的“枢纽”（王发曾，2003a）。城镇化就是以集聚人口为核心，对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追求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和更高层次的优化组合，达到产业结构提升、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发展过程，城镇化水平显示着社会发展成就和前景。城镇化使城市狭小的地域空间里集聚了众多的人口和巨量的物质、能量、财富与信息。这样，一方面，城市以其强大的经济、社会实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机能以及优越的成长发育潜力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生长核；另一方面，城市又因其固有的缺陷、人为的破坏和演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矛盾而成为人类社会所遭受的各种困扰充分表现之地。高度的繁荣伴随着一连串的“城市问题”，人口发展失控、经济结构失调、社会关系失衡、土地负担过重、资源供应紧张、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就业难、住房难、入学难、就医难、乘车难等，已成为现代城市虽程度不同但普遍存在的共同“病症”（王发曾，2003a）。犯罪，就是植根于这样的社会“病灶”中的一颗“毒瘤”，在城镇化进程中，犯罪问题就像“幽灵”一样困扰着城市的生存和发展。

城市犯罪并非今日才有，它伴随着城市的诞生就已成为城市社会一片抹不去的阴影。20世纪后期，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和空间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城市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犯罪率的增长大大高于农村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问题虽然对犯罪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慢城镇化的步伐（程书兵，2008）。党的十六大把“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必然要求城市和乡村为国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居住和工作环境，国民“免受犯罪之侵害”应成为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王颖，2007）。因此，正确处理城镇化进程中显现的或潜在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消除可能加剧或产生城市问题的各种社会因素，打击犯罪个案与铲除犯罪的社会土壤相结合，是缓解或彻底解决城市犯罪的根本途径。本章从城镇化的概念、国际城镇化的趋势与我国城镇化的状况入手，分析了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各种社会效

应，论证了城镇化背景下的我国城市犯罪的特点、形成土壤，导引出城市犯罪空间盲区的概念，为以下各章的展开确定了出发点。

第一节 城镇化与我国的城镇化

始于19世纪末期的旧中国的城镇化，是在西方列强武力和文化双重侵略的形势下被迫展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文革”结束，城镇化进程又几经波折严重受挫，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中国的城镇化才迎来了飞跃发展的黄金时期，目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地向前推进。本节主要分析了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水平评价因素、当今国际城镇化的趋势、我国的城镇化的历史演进、我国城镇化的新特点，为分析我国快速城镇化的社会效应打下了基础。

一、城镇化

“城镇化”一词源于英文“urbanization”，也可译为“城市化”。根据中国城镇体系、城镇规模、城镇结构以及大规模集镇存在的现实，我国学者认为在中国使用“城镇化”更确切。一般来说，城镇化进程包括：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转移；农村人口由乡村转向城镇的居住地转移；农业用地转向城镇建设用地的地域转移；城镇结构、功能、质量的提升和优化；城镇文明向非城镇地区的传播与扩展。

（一）城镇化透视

1. 城镇化的实质

城镇化进程的实质应该是“能够适应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城市性质、状态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发展进程”（王发曾，2007）。城镇化实质上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城镇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而且是城镇数量的增多、地域的扩展、职能的强化和设施的完善，以及城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镇化过程既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村居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提高，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过程。

要了解城镇化的实质，还必须了解集镇化。两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侧重点不同。“城镇化”的侧重点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转移的“城化”过程，而“集镇化”则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向乡村地域内的小城镇转移和集聚的“镇化”过程。后者的实质，就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科技文化素质的增强，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城镇居民靠拢。总体来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既有与世界城市化

相一致的一面，又有特殊的一面，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只能是城镇化。

2. 相关概念

相对于城镇化，“逆城镇化”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外、向外围卫星城镇扩散的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由聚集规模趋近极限而难以持续所产生的种种“城市病”。当城镇的规模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中心城区的一些产业功能、文化功能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镇化”。造成逆城镇化的主要原因包括：集中型的城镇化使得城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居住拥挤、地价昂贵、生活服务费用上升、生活质量下降，引起市区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外的时空距离，迁居郊外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不会产生较大的不便。实际上，逆城镇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集中型城镇化转变为人口向郊外和卫星城迁移的分散型城镇化，是城镇化不同类型的转换。可以说，逆城镇化不是城镇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镇化。逆城镇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5年平均减少了9.68%，而郊区人口平均增长了207%；英国在1961~1971年，城市市区的人口从2 625.3万下降到2 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从1 463.5万增加到1 714.7万。进入21世纪，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镇化”的趋势也愈加明显，据北京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

“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之间通过发展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持续协调发展的过程，是城市与乡村这两种不同特质的经济社会地域和人类聚落类型，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区域范围内谋求融合发展、协调共生的过程。城乡关系经历了或正经历着乡育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联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历史演变。这一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城乡关系演变的趋势，也反映出城镇化进程的阶段性。城乡一体化将城市和乡村看成一个整体，人口、资金、信息和物资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高度依存。城乡一体化的目标是破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城乡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的持续协调发展。城市是城乡一体化的核心，其影响范围基本上就是城乡一体化的存在空间。城镇化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动力，城镇化进程扩大了城乡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容、深度和范围。很明显，城乡一体化不仅是城镇化的高级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是渐进的、双向的，在这个过程

中，绝不是所有乡村都变为城市，更不是城市乡村化，而是彻底消除城乡差别，使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达到城乡共享。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先后不同程度地步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但实现城乡一体化仍是全世界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徐晓霞，2006）。

3. 城镇化水平

衡量地区或国家的城镇化水平，最简易可行并被广泛认可的指标为“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例。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该指标过于单一，很难从实质上刻画出城镇化水平。与此相比，综合指标法是研究城镇化水平更具科学意义的方法。

在广泛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城镇化的内涵出发，根据针对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评价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可把影响城镇化水平的评价因素概括为由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33个三级指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表1—1）。在综合评价城镇化水平时，可选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综合指数法等，根据各指标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利用SPSS或SAS等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从而得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对于某单个区域来说，计算若干年份的综合评价指数，可以研究该区域城镇化进程的时间演变规律；对于某大尺度区域来说，计算内部多个次级区域同一年份的综合评价指数，可以研究该区域城镇化进程的空间变异规律。

表1—1 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备注）
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指标	人均GDP	元（人民币）
		人均住宅建设投资总额	元
		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元
		人均邮电业务量	元
	社会指标	交通运输能力指数	铁路+公路+内河航道里程/ 地区总面积
		医疗水平指数	每千人口有医生数、医院床 位数
		人均城乡储蓄存款余额	元
		居民人均消费水平	元
		人均能源消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指标	第一产业就业所占比重	%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备注)
		人均农业总产值	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	元
		农业土地产出率	元/亩 ^①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指标	工业生产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
		第二产业就业所占比重	%
		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指标	第三产业就业比重	%
	信息化指标	邮电业务总量/GDP	%
		百人程控电话拥有率	%
		每百人上网率	%
制度和 政策	制度指标	社会保障覆盖率	%
		对外开放度	人均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均 利用外资额
	科技指标	人均科技三项费用	元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	人
		10万人授权专利数	项
教育科技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	%
	教育指标	教育水平指数	教师数、大、中、小学在校 生人数/万人
		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人均公共教育经费	元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

注释：①1亩=666.6平方米。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

(二) 当今国际城镇化的趋势

1. 城镇化速度持续加快

21世纪世界城镇化进程仍将保持持续加快的趋势。联合国提供的资料表明，1950年，全世界城镇化率为29%，1975年上升为39%，1990年达43.4%，2000年为46.8%，2006年已上升到49.2%，即目前世界已有大约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世界城镇化进程还将持续加快，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到60%以上（沈建国，2000）。

21世纪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再像20世纪那样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与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其主角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推动了城镇化,数以亿计的人口正在或即将转化为城市人口。据预测,从1950年到203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将由4.46亿增加到10.15亿,2030年将是1950年的2.28倍;而发展中国家则由3.04亿增加到41.02亿,2030年将是1950年的13.49倍(沈建国,2000),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世界范围内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将进一步缩小。1950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城镇化率差距为37.1%,到203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将缩小为26.4%。从全球规模最大的前15个城市来看,1950年发展中国家只有4个,到1994年增加到11个,预计2015年将增加到13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一场迅速的乡村到城市的转型,其城市数量和规模均将迅猛发展(沈建国,2000;官卫华、姚士谋,2000)。

2. 城镇化模式的多样性

城镇化模式是指社会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及其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从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当前世界城镇化可分成滞后、超前与同步城镇化三种模式。

“滞后城镇化”是指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镇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镇化,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镇化模式,既不利于工业现代化,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和居民生活的现代化。

“超前城镇化”是由于城镇化速度快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而造成城镇化的过度发展模式,或称“过度城镇化”。过度城镇化是在农村推力大于城市拉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城市工业化水平落后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主要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大量农村人口迁移后无法实现职业转换,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从而出现“城市病”。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镇化模式。例如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镇化率已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沈建国,2000)。

“同步城镇化”是指城镇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镇化模式。这里的“同步”并不一定意味着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完全一致,而主要是指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还包括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互相协调,城市人口的增长与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相对一致,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数量与经济发展提供的城市就业量大致平衡,城镇化的发展与农业提供的剩余农产品基本适应。发达国家在城镇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关系数极高。这是一

种经济发展推动型的比较合理的城镇化道路，能够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以及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3. 城镇功能发生巨大变化

城市功能的全球化。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西方学者通常把这个时代叫作“后工业社会”或“全球化时代”或“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过程、全球化过程和信息化过程，绝大部分都是在城市完成的，城市功能出现了全球化倾向：生产在全世界日益分散，服务活动越来越与物质生产地空间分离，全球性高端服务活动逐渐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贸易城市……

城市功能的信息化。在信息社会，人类活动对各类信息的要求和依赖性日益增强，信息产业化已开始成为现实。现代城市是各类科研机构 and 人才的荟萃之地，是研究开发新技术、试制新产品的主要基地。城市是信息源，拥有巨大的信息量，并能对信息进行高效的搜集、处理、开发、存储、传输，城市已成为一个地区的信息中心、网络中心、组织中心和创新中心。

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功能分区重叠，带有经济、文化、民族乃至宗教倾向的地方性次级中心会不断出现，城市呈现出多中心趋势。未来最有增长潜力的是城市的边缘区（近郊区），这里将会是投资、就业和家居的最活跃地区，城市功能的多中心化表现得最为突出。

4. 城市的国际化趋向

城市国际化指的是城市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流逐步增强、城市国际知名度逐渐提高的更高级的城镇化过程，是城市进一步向外向型发展、建立广泛的国际经贸联系、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并升级为国际性城市的过程。国际化倾向的城市一般都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一定规模的国际投资机构，拥有众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科技教育事业高度发达，是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共同平台（王士君、李秀敏，1993）。

21世纪，城市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国际间跨国经济活动愈演愈烈，多国财团与公司大幅增加，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生产与交换方式逐渐国际化，产业聚集的价值链愈趋复杂，在合作基础上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城市承办国际会议及国际展览会的欲望与能力不断增强，城市成为国际科技、文化与政策交流的显性平台。在1981~2008年的27年间，世界各国举办的称得上国际性会议的达160 816件，有些大城市一年就举办近300次国际会议，如伦敦2005年举办了578次国际会议，巴黎2008年举办了369次国际会议。

5. 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

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使全世界的城市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多元连锁（顾朝林，2006），形成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这个体系由三级城市构成：

第一级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的金融、信息、流通、通信、传媒和文化中心，

聚集了众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国际金融服务机构以及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具有高度的控制、管理与整合能力，是全球生产、调运、销售、资金流动等经济活动的控制中心。第二级为“专业化生产和服务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所控制的一批区域性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通过对资金、技术的控制，借助发达的信息、交通工具，在全球组织产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使全球形成有机联系的复杂的经济系统。第三级为“依附性中心城市”，是专业化生产和服务中心城市控制的更低层次的配套生产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一个基层子系统。

二、我国的城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由旧中国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镇化水平由7.3%提高到2008年的45.68%，成为世界城镇化发展史上实现城镇化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但是，与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城镇化率还相差30多个百分点，与韩国相比仅相当于该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可以说，未来我国的城镇化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一）新中国城镇化的历史演进

1. 1949~1960年是城镇化的起步阶段

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5 76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6%，城镇化水平很低。到1953年，城镇人口增加到7 82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3%；1958年城镇人口为10 721万人，比重增加到16.2%；1960年城镇人口13 07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7%。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我国城镇化率增长了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83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4）。

这样的城镇化增长速度是较为正常的，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我国的城镇化可能会顺利完成起步阶段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也将由此而真正起飞。然而由于国情所致以及多方面的失误，我国城镇化没有顺利通过这个起步阶段。这些失误包括，对农产品长期实行统购统销、关闭自由贸易；国家垄断工业化，导致工业化与城镇化脱节；城乡隔绝的二元户籍制度……从此，中国的城镇化便进入停滞阶段。

2. 1961~1978年是城镇化的停滞阶段

1961~1978年，我国总人口由65 859万人猛增到96 259万人，17年净增30 4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 788万人；乡村人口由53 152万人增加到79 01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3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91）。而城镇化率的提升却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1961年为19.3%，到了1978年却下降为17.92%，倒退了1.38个百分点。

城镇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的直接原因是，严格禁止农民离乡进城，迫使大批城市居民逆向迁往农村，严重阻塞了城镇化的正常途径。另外，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体

制，完全扼杀了商品经济的活力，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主观随意性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也影响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陈艳涛，2000）。这期间出现了四次反城镇化的逆流。①1958年始，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严格限制了土地用途流转和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②实行僵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城乡进一步分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农民想进城落户极其困难。③1961~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 800万人，动员了近2 000万人城镇人口回到农村去，城镇化水平由1961年的19.3%降为1963年的16.8%，骤降2.5个百分点。④“文革”期间，约有3 000多万城市青年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并安家落户。这样，从1966年到1978年的12年，城镇化水平不足18%，1972年甚至低落到17.1%。

3. 1979~1991年是城镇化逐渐加速阶段

从1979年到1991年的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从19.00%增长到26.94%，增长7.9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0.62个百分点，城镇化进程开始步入快速轨道。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前、后两个时期的深刻变革彻底改变了城镇化的历史轨迹。

前一时期，1979~1984年，农村的改革开放首先推动了新一轮城镇化浪潮。普遍推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由此带来农产品与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极大富裕，从而导致农村的非农业产业（即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掀起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业化浪潮。新兴的小城镇迅速发展，人口流动的自由度空前提高，农村及贫困地区人口向城镇及富裕地区的大流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观景象。据统计，1979~1984年，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39%，是前一阶段的2.88倍。这一时期，我国开始采取控制大城市扩张和鼓励小城镇成长及发展农村集镇的新政策，大量涌现的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对外开放的梯度战略与创办沿海经济特区决策的实施，又在华南沿海地区引发了城镇化迅速扩展的浪潮，深圳、珠海等地处边隅的渔村和小县城，开始迅速崛起。

后一时期，1984~1991年，城市地区与农村的合力将城镇化推进快速轨道。东部沿海城市地区在改革开放中进入大发展阶段，先后设立了4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放城市，并全面开放海南，使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有了实质性的飞跃。东南沿海的城市日新月异，集中了全国最先进的科技、最昂贵的消费和最现代的感受。于是，内地大批人才包括大量的商业精英和科技骨干纷纷跳槽或“下海”，到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谋求更大的发展。数以千百万计的内地农民也成群结队前往打工，“孔雀东南飞”的势头曾多年持续不减。这一时期，我国农民在创造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城镇化模式之后，又

掀起了“离土又离乡”的民工大潮（胡伟略，1998）。

4. 1992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从1992年到2008年的16年，我国城镇化率由27.46%大幅度上升到45.68%，增长18.2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14个百分点，是中国城镇化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一个阶段。人口迁移和流动速度的加快及其规模的日趋扩大，大大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民工大潮”继续汹涌澎湃，全国城镇已有8 000万到1亿人口构成的流动人口大军，农民工进城成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渠道。新时期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三大战略——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使得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市场经济持续完善、社会生活持续和谐，中国城镇化已获得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尽管当前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滞后于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仍然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但毕竟国家整体发展真正走上了城镇化的道路，并以令世人注目的速度持续前行。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层面上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城镇化浪潮，并形成了集群式的城镇化增长板块。继东部沿海地区之后，国家陆续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各种类型的城市群、经济区纷纷组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城市群主导和引导着全国的城镇化进程，省域城市群（例如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分别形成各省（区）城镇化的策动者和组织者，跨省域的经济区（例如海峡西岸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川渝经济区以及拟组建的中原经济区等）为城镇化的核心区域搭建了广阔的承载平台。然而，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些弊端所引发的“城市病”也日渐显露，例如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紊乱等，城市犯罪问题也日趋严重（吴定勇、王珏，2007）。

（二）城镇化的发展速度

1. 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度发展

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年），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逐渐深入人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由“建设四个现代化”转向“建设小康社会”，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30年间，全国城镇人口由17 245万人增加至606 667万人，年均增加1 447万人，城镇化率由17.92%增长到45.68%，年均增长0.93个百分点（表1—2）。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加速度”发展十分明显。将30年划分为3个时段：1978~1990年时段（12年），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 079万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71个百分点；1990~1999年时段（9年），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 506万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0.93个百分点；1999~2008年时段（9年），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 880万人，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21个百分点（表1—2）。